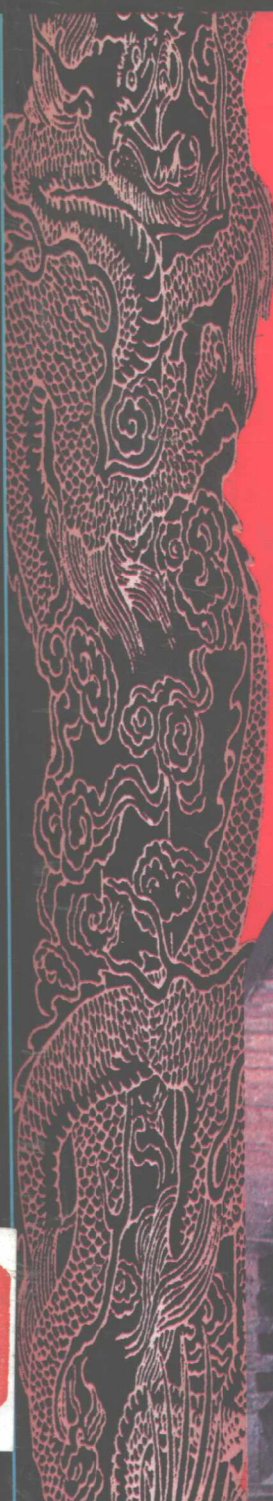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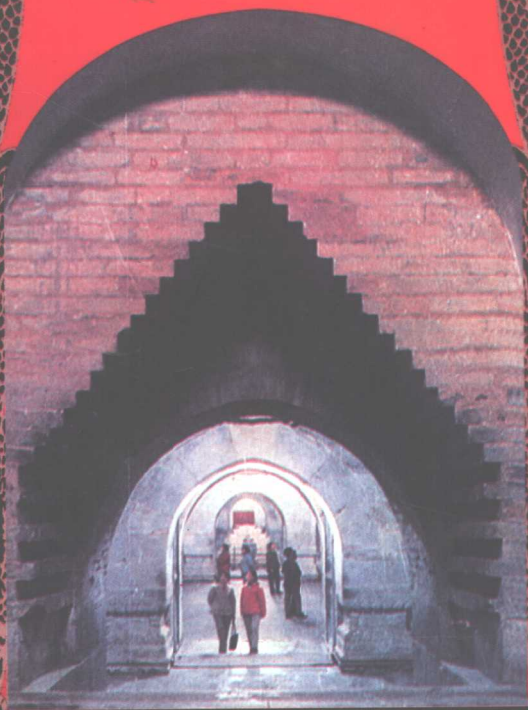


中华帝陵

● 主编

张生三

●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华帝陵

主编 张生三
副主编 杨炳功 黄宛峰
 曲明敬 刘太祥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太祥 曲明敬
 何威震 杨炳功
 张生三 黄宛峰
绘图 杨丰华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皇帝陵墓的通俗性著作。主要特点：①突出一个“全”字。全书共收帝陵 258 座，不仅详尽介绍了那些保存完好、当过皇帝的陵墓，还简述了部分追封皇帝和只有文献记载而无遗迹的皇陵。②突出一个“串”字。从传说时代的黄帝陵到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的袁林，记述上无断代。③突出一个“实”字。文献记载和实地考查相印证，材料真实可靠。④突出一个“普”字。除对有关帝陵的学术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和研究外，又重点对陵主的死因、陵址的选择和营建、葬制葬俗、陪葬祭祀、盗挖发掘、出土文物等都做了通俗性介绍，生动有趣，雅俗共赏。

1997. 9. 16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3637184

中 华 帝 陵

张生三 主编

责任编辑 康 华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邙山书刊商标装璜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5 印张 464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册

ISBN 7-5348-1532-0/K·563

定价：25.80 元

序

中华帝陵，地面有巍峨的陵丘和殿堂，地下埋葬着数不清的奇珍和异宝。它们是中国劳动者的智慧结晶，也是绵长的中国历史最直接的见证。它们凝聚着中国人的天道、神鬼、哲学、宗教、地理、人文以及审美、习俗等等方面的综合意识观念，展示着中国古代建筑、园林艺术和文物、典章制度的具体景观，是一项极有价值和珍贵的中华文化遗产，很久以来，就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珍视，为社会所爱护。近年来有关帝王陵墓研究的论著虽不断面世，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华帝陵的书。南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的张生三、杨秉功、黄宛峰诸先生，花费了数年的时间，搜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还不避寒暑、不辞辛苦，对帝陵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中华帝陵》这部书的编著。这不仅为旅游参观、科学普及推出了一本有益的读物，也为对帝陵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价值的参考，更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书收录了中华帝

陵 258 座，对帝陵所葬皇帝和地上地下的辉煌建筑作了全面介绍，不乏新的见解，尤其是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情况相印证，更显得学术性与通俗性的高度统一。当然，陵寝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学术课题，涉及面广，资料又感不足，有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值此成书之际，我先睹为快，援笔为序，谨缀数言述意，相信此书会引致广大读者，对帝陵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有更多的了解，更多的兴致，更多的关心。要对本书的价值作出准确的评论，还有待于方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燃

1996 年 10 月

自 序

帝陵是埋葬帝王的地方。历代帝王是封建社会的象征，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宗教迷信的盛行，帝王为了煊赫权势和财富，使死后仍享受人间的欢乐，他们无不大兴土木，竭天下之财力，营建自己的墓地。宏伟的地面建筑，坚固的地下宫殿，豪华的殉葬精品，繁缛的帝陵礼制，蕴含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它完全可以和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一座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掘震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对帝陵文化进行全面的开发和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反映中华民族智慧和才能，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展中国的旅游事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也大有裨益。

一、帝陵可以反映出历史的兴衰，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历史的发展进程。

纵观历代帝陵的规模，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历史时期所建造的帝陵就规模宏大，保存亦完好；反之，在政治腐败、党争炽烈、社会混乱、

经济萧条的历史时期所营建的帝陵就草率，规模小质量差。可以说帝陵是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繁华消歇的缩影。例如，秦始皇陵，唐代前期的昭陵、乾陵、桥陵，清朝前期的孝陵、景陵等，修陵投入人数多，速度快，质量高。其陵墓制度、规模及文化，表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而唐代中后期和明清中后期的陵墓则呈现衰微而更趋于敷衍的境况。

二、帝陵可以反映出历史不同时期生产力和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使人们了解到中国在许多方面，曾在世界科技史上是遥遥领先的，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从帝陵的发展进程来看，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而发展变化的。秦汉帝王陵墓的封土坟头造型，大都采用方上的形式，即在地宫之上，用黄土层层夯筑，成为上小下大的方锥体。地宫一般采用木椁及“黄肠题凑”。《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说：“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东汉时，砌筑地宫，采用砖石发券的办法，砖石表面刻有各种图案花纹；其后，砖石发券或叠涩砌筑的帝陵在不断发展。采用砖石发券砌筑帝陵的有南京南唐李昇、李璟陵，成都前蜀王建永陵等；到明清时，这种陵墓的规模就更宏大完备了。从明定陵地宫发掘证明，汉白玉、艾青石和花斑石的巨大石块已经成为营建帝陵的主要建筑材料。帝陵地宫由木椁变为砖石材料的发券结构，明显地反映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科技的提高。唐朝由封土为陵而变为依山为陵，需具备一定的钻探和勘测技术，难度加大了。明清两朝的帝王陵，都采用宝城宝顶的形式，即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形成一个大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这城墙称为“宝城”，高出城墙的土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的形式，在建筑构造上比以前的方上形复杂得多了，技术上的要求更高了。“宝城”、“宝顶”形的建筑，充分证明当时已经运用

运筹学的原理进行工程计算，施工中使用了技术高的机械设备和仪器，比如类似手摇卷扬机、千斤顶、罗盘针等。从帝陵地面建筑规模看，秦汉时期有祭祀用的寝殿，还建有原庙。唐代建享殿（献殿），明建、陵恩殿，清称隆恩殿，旁有配殿、廊庑，前面有焚帛炉、大门等建筑。殿内有祭坛（明清称五供），供祭祀用的建筑规模及设施越来越大，营造技术越来越高。例如，清陵前供祭祀的建筑物繁多，自方城明楼往前分别为：石五供桌、三柱门、三座门、三孔桥、隆恩殿、东西配殿、焚帛炉、隆恩门、值房、朝房、神厨库、祭殿碑亭。帝王陵前神道两旁的石刻，秦汉诸陵尚未发现，仅霍去病墓尚存 14 件，而且是自然石略加雕饰而成。到东汉时，在河南、四川等地的墓阙旁尚存有石兽，名叫“辟邪”，又称“天禄辟邪”，取天赐其禄，避除邪恶之意。南朝陵前辟有很长的神道，顺势直到平岗。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等。陵前石刻保存最为完整的当数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有石兽、石柱、石碑等四对石刻。南京甘家巷肖秀墓前也有四对石刻。唐朝陵前的神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型的石刻仪仗队“石象生”已经形成。陕西乾陵的神道，全长有一公里许。神道两侧，借梁山双峰为天然之阙，峰顶建阙楼，远望之形似双乳，遂被人称之为双乳峰。神道入口处，建望柱一对，望柱之后依次为冀马（又称天马）一对，朱雀一对（为鸵鸟形象），引石人石马五对，石人像十对，石狮一对（另有 61 王宾石像，不在神道上，作为附加内容）。明清帝王陵神道的石象生发展到了顶峰。明十三陵的神道全长 7 公里。清东陵神道长达 5 公里。东陵神道的石刻为：石牌坊，大红门，更衣殿，神功圣德碑楼，影壁山，石望柱，石象臣，龙凤门，七孔桥，神道碑亭。这些陵道的石刻雕塑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从墓内发掘的文物看，秦始皇陵墓内的铜剑、镞，至今闪闪发光。经化验表明，铜锡为主要成份，并含有微量的稀金属，表面进行了铬化处理，这是长期不锈

的主要原因。始皇陵墓的陶俑、战马、战车近万件，组成阵式。汉代帝陵有各种骑射俑、舞蹈俑、杂技俑，除此还有与生产有关的陶屋、陶楼、井、灶、圈及陶猪、牛、狗、鸡、鸭等。唐代“三彩俑”的造型艺术达到了高峰。女俑丰腴圆润，表现了盛唐国实民强的审美风尚。还有深目高鼻的“胡俑”、远载货物的骆驼俑，表现了唐代东西交通的发达情况。所出土的殉葬实物，殷周时期用青铜器制造的酒器、礼器，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还有丝织品、漆器、瓷器、金银、玉石、文献、墓志、碑刻、简牍文书、绘画、书法等无数珍宝，都反映了当时科技水平是很高的。吴越王钱元瓘之墓出土的石刻天象图，比世界上公认的古石刻星图——苏州天文图早300多年。其观测年代大致在唐开元年间(723~741)，记载星座183，是研究星体变迁的珍贵资料。

三、帝陵可以反映出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

大约在原始社会中期就产生了神与灵魂的观念。墓葬内的随葬品有燧石、石器、石珠及穿孔兽身等物，说明帝王都把坟墓作为灵魂的安托之所。把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等随帝王而去，到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这是帝陵文化反映出的神鬼观念。人死后成神升仙，本属道教思想。帝陵内外的阳鸟、东西王母、龙舟和镇妖驱魔的动物造型以及唐陵神道两侧的翼马(天马)、狮子等都取其意。随着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帝陵中石殿除雕刻孝子忠臣故事外，佛教思想内容深入到陵墓中来。北魏孝文帝永固陵园中，就布置了佛寺。到北魏晚期，祈佛之风愈演愈烈。西魏文帝乙费后竟在秦州“凿麦积崖为龕而葬”，即在巩义市麦积山石窟寺的佛窟之后营建墓室，麦积山第43窟就是一例。北齐高祖高欢死后，也秘密地葬于磁州鼓山智力寺的“天宫之傍”，将墓室凿于佛窟中心柱的顶部，邯鄲北响堂第六窟就是这种形式。据考古发掘的大量实物证明，隋朝之后陵祠建筑中反映出浓厚的佛教色彩。隋文帝的太陵出土了大量的莲花方砖和瓦当，以菩萨

瓦当最为突出。石狮是佛教中的常见神兽，陵前置石狮，始于北魏，意在守门辟邪。唐始，陵前石刻有华表和胡桃型的柱顶。胡桃是摩尼宝珠，置此，意“是宝常能出一切宝物，衣服饮食，随意所欲，尽能与之”。陵园内大量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天人出行图，和象征佛教的莲花朱雀、兽首鸟身怪兽、瓶莲、双莲花纹以及石刻上的变形缠枝流云穿线纹、变形忍冬多枝莲、变形三朵云纹缠枝莲、缠枝牡丹等等，都与佛教有关。清代乾陵裕陵地宫四壁券顶都布满了多姿多态的佛教文化石刻。

四、帝陵可反映出古代的礼制和风俗

封建社会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帝陵文化的核心亦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帝陵的设计，布局与建筑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唐代陵园的设计模式，都仿古长安城的建筑格局，地宫中的礼仪也有严格的规定，反映出的门列荣戟制度、仪仗出行制度、六尚官制度等，都与文献记载的宫廷制度相吻合。明定陵的地宫采用“前朝后寝”的制度，模仿帝王生时的方式，追求“死犹如生”之意。定陵地宫的前半部为长而宽的隧道，犹如紫禁城前的重门广道。地宫前、中、后三殿及左右配殿，顶部铺琉璃瓦，型同地面上的皇宫。殿与殿设门相隔，前殿的前面，有一方形券室做为前庭，象征着紫禁城前面的广场。秦始皇陵内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形同人间天地。各个朝代的葬俑形态，风格各异，但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双眉画作八字低”的诗句，实物作证，唐代女俑确有八字眉的画法。不同时代的祭祀制度，在陵墓中反映的也很充分。

五、帝陵的建筑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and 才华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兵俑威风凛凛，形象逼真。有的注目沉思，有的满腔智慧；个个短袍束带，扎绑腿，挟弓弩，挎箭囊；战马嘶叫，欲跳坑外。驰名中外的唐太宗

“昭陵六骏”浮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栩栩如生。乾陵神道石刻，是唐代石刻艺术精品，是我国古代艺术瑰宝。慈禧陵隆恩殿前的陛石采用突雕手法，龙在下，凤在上，呈龙凤戏珠的画面，犹如真龙真凤在彩石间飞翔舞动，堪称石雕中的杰作。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在帝陵也得到充分的表现。汉代墓葬中有很多画像和画像砖；六朝发现浮雕模印砖画墓；唐代绘画艺术丰富多彩，昭陵陪葬大量的壁画，颜色绚丽，布局严紧，体裁多样，以表现贵族生活的人物画为主，有出行、歌舞、游戏、陪臣、侍女等。技法以线条与着色并重。有些壁画的着色已经由面部薰染扩大到衣着和器物，使画面层次更为丰富。乾陵陪葬墓中反映皇室贵族生活的“侍女图”，建筑艺术图，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马球图”、“客使图”等等，都显示出唐代绘画艺术的高超水平。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秦统一文字，以小篆为书，到汉演变为隶书，魏晋以后又变化为楷书和草书。历代出现不少书法家。誉为“书圣”王羲之的墨书原迹，大多在漫长岁月中佚失或湮没，当今鲜见的几乎都是碑刻墓志的文字。唐代昭陵碑刻就显示了初唐书法绚丽多彩的景象。其中初唐大书法家欧阳询的温彦博碑，褚遂良的房玄龄碑，王知敬的李靖碑等著名碑刻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李治撰书的李绩碑，具有‘书圣’行草体飘逸洒脱的风格。可以说，昭陵是唐代书法艺术荟萃之所。还有许许多多的工艺品，都反映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六、帝陵的发掘与开放，是新时期旅游业的重要资源，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扩大，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溶的帝陵开发事业，将有极大的潜力与发展前景。

帝王陵园选地非常讲究，多“背依山峰，面临平原”，所谓“堪舆”之术，讲望气、风水，有山有水，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南方六朝陵墓，墓地在山腰、山麓山上，地面建筑和石刻等物均在广阔的平地上。元成吉思汗的陵地，是他亲自选定的。传说他

路过此地，春光明媚，景色迷人，久久不忍离去，决定百年后就葬在这里。明孝陵位于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南麓的独龙阜，林木苍苍，松柏参天，浓荫蔽目，溪涧蜿蜒，流水潺潺。

帝陵豪华的地面建筑，地下宫殿的雄伟和蕴藏的稀有珍宝，以及风光优美的诱人之地，吸引着国内外众多的文人骚客和游人，给旅游业的发展开辟了极为美好的前景。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遍布青山绿野之中难以胜数的帝陵原貌，遭到严重破坏。墓中文物被盗，陵墓被湮，文献失散，这对挖掘帝陵和研究帝陵带来许多不便。所以迄今没有一部较为全面介绍和研究帝陵的专著问世。笔者，试图汇历史文献之全，经过实地考察访谈寻迹，广泛搜集资料，耗费五年的心机，成书名曰《中华帝陵》，意在抢救保护帝陵的遗迹遗物，拯救一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实谓终生夙愿。

《中华帝陵》一书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突出一个“全”字。全书共收帝陵 258 座，为国内见书书之冠。该书收录了当今保存较为完好的著名帝陵，如秦始皇陵、乾陵、昭陵、茂陵、慈禧陵。除此，还收录了仅有文献记载而无遗迹的帝陵，如炀帝陵等。既对当过皇帝的陵墓进行详尽的介绍，又对部分有影响的追封为皇帝的陵墓摘其要而述之。汇集之多，介绍之广，为全书的第一大特色。

第二，突出一个“实”字。主要表现在材料来源真实。有关帝陵的资料素材，大量见于廿六史的帝王传记。同时，查阅参考验证了古典文献专著，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典志体史书和其它有价值的别史杂录，对地方区域性的方志中有关帝陵的记载，也慎取之。对所采用的史料，经过严格复核，务求确实无误。在博览浩翰的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又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民间传说，丰富了此书

的内容。我们的考察工作，得到各地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先后到关中、关外，川中、河洛和大江南北，行程数万里，对帝陵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访问，订正了文献记载和有关论著中的某些失实之处。使帝陵全书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除此而外，还广泛吸收了海内外学术界对帝陵研究的新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清德宗（光绪帝）死因的考订，日本学者对清世宗（雍正帝）死因的新见解，广东省深圳市赤湾村的新发现，洛阳、西安对汉唐陵墓发掘的新材料等。

第三，突出一个“普”字。全书以普及为主兼有提高，雅俗共赏，老少宜读。既对帝陵学术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又对帝王陵的传说趣闻佚事摘要介绍。用通俗的语言叙述，鲜明生动，趣味盎然，使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并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在编写《中华帝陵》一书的过程中，我们按照下列原则。（一）分朝代按顺序介绍帝陵。在每一朝代或每一时代的开始，先总述该期的葬制葬俗、陵墓分布、陵墓特点，然后分述每座帝陵，再叙述与陵有关的问题；（二）该书介绍的重点是涉及帝王陵的诸多问题，如帝王陵主的死因，陵址的选择与营建，帝陵遭损破坏与修缮扩建，葬制葬俗，陪葬与祭祀，帝墓的盗挖与发掘，出土文物与价值等；（三）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介绍帝陵本应从嬴政陵写起，但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为了尊祖拜祖，该书亦收录了《太昊陵》、《炎帝陵》、《少昊陵》、《黄帝陵》、《尧陵》、《舜陵》、《大禹陵》等史前传说时代的陵墓，以满足炎黄子孙的需要。（四）该书原则上只介绍当过皇帝的陵墓，对于追封为皇帝的陵墓一般不予收录，但是对那些为以后建国称帝打下基础而追封为皇帝的陵墓，摘要收录少许，如《魏武帝曹操高陵》等。另外，为完整介绍清代关外三陵区，收录了清追封皇帝陵《清祖陵永陵》；介绍南朝齐梁丹阳陵区时，

收录了追封的皇陵，如《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和《梁文帝萧顺建陵》等。（五）为了避免重复，凡牵涉两位皇帝以上的要事，只在某一帝中从详，他帝中则从略。比如“沙丘之变”，在《秦始皇嬴政陵》中做了详细介绍，而在《秦二世嬴胡亥陵》中一笔代过。一个时代帝陵的建筑物类同者，只在一代先帝陵中全面介绍，他陵中不写或从略或述之特色。（六）由于十六国、北朝、元朝政权帝陵的史料缺乏，只好做简单介绍。

另，书中文后附有《中华帝陵分布示意图》及其帝陵分布分布图和《中华帝陵一览表》，供读者参阅。

本书主要是我们利用几十年高等师范教学集累的资料而加浅薄经验集体编撰而成的，同时参阅了前人与同人的著作，撷取其精要；实地考察时得到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此时表示由衷的谢意。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该书编撰、修改、出版问世的过程中，中州古籍出版社的青年编辑康华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深表感激。该书涉及面广，跨度大，笔者缺乏经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学者专家及读者赐教，以便再版时完备修订。

张生三

1997年1月16日

陵制述略

一、从椁室到地宫

中国远古时候，帝王葬处并不称“陵”而称“墓”。商朝的建立者汤的葬地就名“桐宫汤墓”。春秋时，有称墓地为“丘”的，如楚昭王墓名“昭丘”，吴王阖闾墓称“虎丘”，也有称“陵”的，如晋襄公墓名“襄陵”。至秦，称帝王墓为“山”。如秦始皇墓本名“丽山”，也写做“郿山”、“骊山”。汉代以后，帝王的坟墓才专以“陵”相称。

人类早期，并没有修建坟墓的习俗。亲人去世也不埋葬，而是把尸体抛在荒郊旷野，去让“狐狸食之，蝇蛄咕嘍之”（《孟子·滕文公上》）。随着人类意识的觉醒和灵魂观念形成，活着的人再不忍逝去的亲人暴尸荒野，开始将尸体掩埋土中，于是“墓”出现了。“墓”的古义是“葬而不坟”。早期的墓很简单，只是向地下开掘一个竖穴，将尸体放于底部，周围用一些柔软的树枝、树皮和乱草加以裹衬，再用土填实，地面上不留任何标志，这种“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的葬法，在上古延续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棺椁葬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的，“棺者，关也，所以掩尸”。传说黄帝时就有了棺，帝尧死“窆（kuán）木为棺”，是把一段粗大的树干挖空做成，帝舜死用的是“瓦棺”。大禹死，用的是“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墨子·节葬下》）。夏代（公元

前 21—前 16 世纪)的一些帝王们开始用“埴”(烧制的砖)修建墓室。殷商时代(公元前 16—前 11 世纪),有了用榫卯接合而成的木棺,在棺外还使用了椁(guō),“椁者廓也,所以开廓辟土,无令迫棺”(《白虎通·崩薨》)。它是无底无盖的一个大的框箱,棺椁的作用是“所以藏尸,令貌全”。1976 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出的殷代王陵里,遗存有棺椁的痕迹,其椁系用两米长的木材构成的宽大的框架式“椁室”,总面积达 300 多平方米,棺的外壁涂有红黄色的胶漆,棺的内壁则刻有纹采。这一发现使《礼·檀弓》所记“殷人棺椁,有胶漆之用”得到了证实。这种帝王用的“椁室”,到了后世,规模日益扩大,其空间更宽阔,其建造更精巧。由汉代的“黄肠题凑”,到唐代的石室,宋代的“皇堂”,发展到明、清,帝王的墓室成了罕见的、宏丽无比的“地下宫殿”。

西周时候,讲究厚葬,《白虎通》记载:“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将去,不可又得,故宾客之也”。这时,天子的棺椁有四重之多,最里面的名叫“革棺”,是用犀牛和水牛皮叠制而成。厚 6 寸,它既柔软又耐水浸,故用在最里面以盛尸,第二重名“柩(yì)棺”,是用轻而耐湿又不易变形的榿木制成,也称“榿棺”(榿 pǐ,木名,其汁可为漆)。第三重称“属棺”,用梓木制成,厚 6 寸。第四重名“大棺”也以梓木制成,厚 9 寸。《埤雅》:“梓为百木之长,呼为木王”。因此,人间帝王就要用这树中的帝王做他的“冥屋”,所以帝王的棺木称为“梓宫”,最外面的是椁,天子的椁厚达 1 尺。《礼·丧服大记》:“天子柏椁,君(诸侯)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天子的椁与大夫的椁虽都是柏木制成,但有很大区别,大夫一级所用之椁,系一般柏材。天子之椁“端长六尺,方一尺”,其长度、厚度远大于大夫所用,而且还是“黄肠题凑”制成。所谓“黄肠”,是指制椁的木料全采用柏木的姜黄色木心,所谓“题凑”,则是指制椁时,将黄色柏木心端头,皆朝向内方。这种椁,只有天子才可使用。天子下葬时,先以“黄肠题

凑”筑成阔大的墓室，再在椁室内铺上“文茵”（虎皮制成），将棺木放在上面，棺外蒙着彩绘的棺衣，上面覆盖的名“柳衣”。四侧的称“墙衣”，柳衣又名“荒”，墙衣又名“帷”。帷和荒又合称“见”。意思是“棺柩不复见，唯见此帷荒”（《仪礼·既夕礼》）。天子的“见”上，绣着盘龙和黑白相间的文采，称为“龙帷黻（fú）荒”，棺墙之外，放置着名叫“罍”（shù）的东西，它是用各种颜色的羽毛做成的一种饰物。椁室还用木料隔成许多长方形的“厢”，椁室上方覆盖着“折”，这是一种用木料制成的形状像床而无足的东西，折上再覆盖“抗席”（用竹、苇编织而成），抗席之上再覆以“抗木”（平铺的方木），天子的棺椁上要覆加五层杭木，（《仪礼·既夕礼》），以保证对墓土有足够的承受力。这种大型木结构“玄宫”到春秋战国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吕氏春秋·节丧》：“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即棺椁之外还堆砌炭、石，以增强其防水性能。汉代时候，皇帝“玄宫”規制是“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槨椁，黄肠题凑”（《观堂集林·南越黄肠木刻字跋》转引《汉仪注》）。《周礼·方相氏郑注》也说：“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可见这时的“黄肠题凑”木制“玄宫”之外，还砌有一道条石围墙，这种条石名黄肠石，历来有不少的发现，多为长条形、修短不一、上有题字记明其尺寸大小和监制者的官衔和名字，此种大型木构玄宫虽为皇帝专用，但汉代的皇帝也往往把它作为一种特别的恩赐，赏给死去的亲信大臣使用，以示特别的优待和荣宠，这种地宫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过。1974年6月，在北京丰台区郭公庄大葆台，发现了汉武帝第四子燕王刘旦的墓，该墓完全以皇帝制度修建，五重棺木之外，是极其考究的木椁玄宫——黄肠题凑，于是这种地宫第一次得到证实。研究者一般认为这种大型木椁墓室为两汉主要墓式，不过，汉代皇帝也有用石椁的（石椁墓室春秋时已出现，见《汉书·刘向传》）。汉文帝曾说，他要